

中 | 华 | 国 | 学 | 文 | 库



阮籍集校注

〔三国魏〕阮籍撰

陈伯君校注



中华书局

中 | 华 | 国 | 学 | 文 | 库



阮籍集校注

〔三国魏〕阮籍撰

陈伯君校注

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阮籍集校注/(三国魏)阮籍撰,陈伯君校注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4. 10

(中华国学文库)

ISBN 978-7-101-10396-0

I. 阮… II. ①阮…②陈… III. ①古典诗歌-诗集-中国-魏国②古典散文-散文集-中国-魏国 IV. I213.6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08772 号

-
- 书 名 阮籍集校注
撰 者 [三国魏]阮 籍
校 注 者 陈伯君
丛 书 名 中华国学文库
责任编辑 俞国林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-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版 次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张 12 $\frac{1}{2}$ 插页 2 字数 320 千字
- 印 数 1-8000 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10396-0
定 价 35.00 元
-

中华国学文库出版缘起

《中华国学文库》的出版缘起,要从九十年前说起。

1920年,中华书局在创办人陆费伯鸿先生的主持下,开始编纂《四部备要》。这套汇集三百三十六种典籍的大型丛书,精选经史子集的“最要之书”,校订成“通行善本”,以精雅的仿宋体铅字排印。一经推出,即以其选目实用、文字准确、品相精美、价格低廉的鲜明特点,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国人研治学问、阅读典籍的需要,广受欢迎。丛书中的许多品种,至今仍为常用之书。

新中国成立之后,党和国家倡导系统整理中国传统文献典籍。六十餘年来,在新的学术理念和新的整理方法的指导下,数千种古籍得到了系统整理,并涌现出许多精校精注整理本,已成为超越前代的新善本,为学界所必备。

同时,随着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快速发展,全社会对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——国学,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。让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得到继承和创新,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和弘扬,普惠全人类,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。当此之时,符合当代国民阅读需要的权威的国学经典读本的出现,实为当

务之急。于是,《中华国学文库》应运而生。

《中华国学文库》是我们追慕前贤、服务当代的产物,因此,它自当具备以下三个基本特点:

一、《文库》所选均为中国学术文化的“最要之书”。举凡哲学、历史、文学、宗教、科学、艺术等各类基本典籍,只要是公认的国学经典,皆在此列。

二、《文库》所选均为代表当代最新学术水平的“最善之本”,即经过精校精注的最有品质的整理本。其中既有传统旧注本的点校整理本,如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也有获得学界定评的新校新注本,如余嘉锡《世说新语笺疏》。总之,不以新旧为别,惟以善本是求。

三、《文库》所选均以新式标点、简体横排刊印。中国古籍向以繁体竖排为标准样式。时至当代,繁体竖排的标准古籍整理方式仍通行于学术界,但绝大多数国人早已习惯于现代通行的简体横排的图书样式。《文库》作为服务当代公众的国学读本,标准简体字横排本自当是恰当的选择。

《中华国学文库》将逐年分辑出版,每辑十种,一次推出;期以十年,以毕其功。在此,我们诚挚希望得到学术界、出版界同仁的襄助和广大读者的支持。

中华书局自1912年成立,至今已近百岁。我们将《中华国学文库》当作向中华书局百年诞辰敬献的一份贺礼,更是向致力于中华民族和平崛起、实现复兴大业的全国人民敬献的一份厚礼。我们自当努力,让《中华国学文库》当得起这份重任,这份荣誉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2010年12月

出版说明

《阮籍集校注》是陈伯君先生(一八九五—一九六九)的遗著。陈伯君名绍功,以字行,湖南湘潭人。一九二〇年毕业于北京大学,在校时曾师事黄季刚(侃)、黄晦闻(节)、马夷初(叙伦)、吴瞿安(梅)诸先生,毕业后从事教育、新闻等工作,建国后任国[政]务院教育部、高教部秘书和研究员。性耽文史,长于诗词,著有《双蕉草庐诗词稿》五卷。

在本书之前,阮籍作品向无诗文合集的校注本,唯《咏怀诗》部分有黄节等人的注本行世,本书是第一次对阮籍诗文进行逐篇校勘和注释的整理本,其中引用大量第一手史料,既能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,同时也有很多独到的见解。尤其是对《乐论》、《通易论》、《达庄论》、《通老论》等文的注释,作者从当时社会政局、哲学思潮出发,结合阮氏一生的出仕、交游等情况,加以多方面的研究,寻奥探幽,堪称阮文的解人。

一九六九年陈伯君先生逝世,本书并未最终定稿,一九八五年我们议定出版,出于对已故作者的尊重,整理时只做了原稿钞清,标点统一,改正个别明显笔误的工作,其他一仍原貌;另因阮籍四言诗只收录见于类书的三首半,为方便读者的阅读研究,据逯钦立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增补其余十首作为附录,于一九八七年十

月正式出版,成为阮籍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籍。

由于本书为据遗稿整理,体例留有欠缺,校注文字也大都未经与原始文献对核,加以出现部分排版编校错误,面世后先后有李景华《〈阮籍集校注〉失误评议》(载《北京师范学院学报》社会科学版一九九二年第六期)、韩格平《〈阮籍集校注〉补正》(载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一九九五年第一期)等文章指出本书中存在的文字错讹,并就相关学术问题进行商榷,读者可以参看。

此次收入《中华国学文库》,我们对已发现的错误做了订正。然限于我们的学识与能力,书中错讹仍或难免,敬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二〇一四年八月

序

序

阮籍(公元二一〇——二六三)生活在一个政治上极端动荡的时代,在全国范围内,统治者分裂为三个互相敌对的政权(三国)。他是陈留郡(当时属兖州)尉氏县人,属于魏。他的父亲阮瑀和曹家父子有过亲密的关系。而他的一生,却碰上了中国历史上自王莽以后的两次所谓“禅代之局”:少年时(十一岁)看到了汉禅于魏,而在晚年则又逼近了又一次的“禅代”(他死后两年,魏禅于晋),正是所谓“螳螂捕蝉,黄雀在后”。尤其是后一个禅代,内部的斗争是剧烈的、残酷的。他经历的是这样一个时代,这对于他的思想和生活态度不能不发生重大的影响。

阮籍本有“济世志”(《晋书》本传),是想爬到统治阶级的上层好好地“作为”一番的。他打算怎样“作为”呢?根据他现存的著作来看,不外是儒家的那一套。《通易论》阐明“易”理,提出他自己对于“易”的看法,实际上也就是他的世界观(宇宙观、社会观、人生观)。他说:“易的起源是在‘天地一终,值人物憔悴,利用不存,法制夷昧,神明之德不通,万古之情不类’的时候。庖牺氏作了八卦,于是‘南面听断,向明而治’。黄帝、尧、舜这些先王‘以建万国,亲诸侯’,‘是以上下和洽,裁成天地之道,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’。

‘先王既歿’，那就不行了，惟有依靠‘君子’来‘一类求同，遏恶扬善’，‘于是万物服从’，‘子遵其父，臣承其君，临馭统一，大观天下’。到了‘季叶既衰’，那就只好‘应运顺天，不妄其作’。然而‘道至而反，事极而改’。怎样改呢？那就是‘改以成器，尊卑有分，长幼有序’。贤人君子到了‘穷侈丧大夫之位’的时候，就‘群而靡容，容而无所，卑身下意，利见大人……入而说之，说而教之，顺天应人，焕然成章。”他说：“明乎天之道者不欲，审乎人之德者不忧。在上而不凌乎下，处卑而不犯乎贵。故道不可逆，德不可拂。”这一套维持统治秩序的理论，正是儒家一脉相承的一贯主张。而他把这些主张，都说成是本着“易”理的，所以说《易》这部书是“覆焘天地之道，囊括万物之情”。

具体的办法则见于他的《乐论》。他说，政治的四大项是刑、教、礼、乐。刑、教是外（从外制之），礼、乐是内（自内发之）。乐（歌与舞）更重于礼，能使“日迁善成化而不自知”，“刑赏不用而民自安”。因为“圣人立调适之音，建平和之声，制便事之节，定顺从之容，使天下之为乐者莫不仪（取法）焉”，“自上以下，降杀有等，至于庶人，咸皆闻之，歌谣者咏先王之德，俯仰者习先王之容，器具者象先王之式，度数者应先王之制。入于心，沦于气，心气和洽，则风俗齐一”。其关键就在于一切歌辞、舞容，乃至乐器的制度、器材和音调，全国都是统一的，乐声是平和的，人民习惯了，不知不觉间成为自然的性情，就能够“定万物之情，一天下之意”，“使去风俗之偏习，归圣王之造化”，“下不思上之声，君不欲臣之色，上下不争而忠义成”。乐也要“应时变”，所以“五帝不同制，三王各异造”，但只是“改其名目，变造歌咏”，“各宣其功德于天下，通其变使民不倦”，至于乐声则不变。到了“衰末”，因为“其物（指乐器的器材）不真，其器不固，其制（制度）不信，取于近物（就地取材），同于人间，各求

其好，恣意所存，闾里之声竞高，永巷之音争先，童儿相聚以咏富贵，刍牧负戴以歌贱贫”，所以“君臣之职未废，而人怀万心”了。

这样一套政治主张，在当时这样一个动荡的局面之下，当然是无从施展的。何况“魏晋之际，天下多故，名士少有全者（《晋书》本传）”。阮籍虽然“弱冠尚未知名”，但后来就“物望甚高”，与嵇康并为“竹林七贤”的领袖而“声誉广被”了。在他四十岁的那年，司马懿一下子杀了何晏、邓飏这班人，致一朝天下“名士减半”，而后来又杀了夏侯玄，更是那班名士的魁首。阮籍在这样的威慑之下，终于放弃了他的“济世志”，转为自全之计，他“博览群籍，尤好庄老”，从老、庄那里求得出路。他一方面论“易”，论“乐”，一方面“尤好庄老”，两者显然不是同时并存，而是有时代的先后的。他的思想，可以说是由“儒”入“道”，他传下来的论著，除《通易论》和《乐论》外，就是《达庄论》和《通老论》。不过，道家的思想到了东汉之末，已经和方士的道术合流，成为所谓的“道教”，阮籍的思想，也不免受了这个影响，他的思想已经不限于庄子的哲理范围。试看他的《达庄论》的末段：“且庄周之书何足道哉！犹未闻夫太始之论，玄古之微言乎！”可见他是并不以庄周的思想为满足的。他的《通易论》也孱杂了一些五行家言在内。再看他的《清思赋》和《大人先生传》，那种飘飘云际、神游八表不是一个神仙世界么？比起庄子的所谓“乘彼白云，至于帝乡”（《庄子·天地篇》），又不知迈出了多少步。他的生活态度，也并不只是“以庄周为模则”（《三国志·王粲传》）的，他蔑视礼教，固然是思想上的解放，实际上还是佯狂避世。试看他初闻母丧的时候，虽然饮酒食肉，与客围棋，若无其事，然“举声一号，呕血数升”，可见他内心实在悲痛已极，不过是强作镇静，并非真正是那么泰然的。但是，他由“儒”入“道”，由“有济世志”而转为“逃空虚”，只是出于自全之计，并不是思想认识

上的变化,所以,这一转变是不会彻底的。何况早年所受的影响,也很不容易一下子从根挖掉,因此,在他的思想上是有着矛盾的。又何况他的“逃空虚”只能是思想上的解脱,并不能见于实际行动,因为在那样一个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剧烈的时代,一个极有名望而又曾参与过政治活动的人,如果真的逃避起来,那就会被当权者的一派怀疑为党于敌对派别而不能放过他,反而不能自全。试看他的“神契”的朋友嵇康终于招致了杀身之祸,便是这个缘故。他不能像孙登那样,所以他对于孙登(《大人先生传》中的大人先生)真是不胜艳羡。但他在统治阶级里面又不是一味依附权势,做忠实的奴才,只顾提高自己的地位。他有他自己的政治抱负、政治主张,对当权者的所作所为,尤其是那些彼此残酷争夺的血淋淋的事实,不能不有是非、善恶的辨别。他虽然“至慎”,“口不臧否人物”,但他自会有“皮里阳秋”的,这种“阳秋”,从他的“青白眼”里表示出来。这就更增加他的内心的矛盾。这种矛盾冲突剧烈,简直找不到出路。只看他“每次出游,任意所之,不由径路,车辙所穷,辄恸哭而返”,正是他的内心矛盾重重,走投无路,痛苦万分的一个恰好写照。他的这种有时痛苦到恸哭程度的内心矛盾,无处倾诉,只能倾吐于他的文学作品中。除了传下来不多的辞赋和散文(尤其是《大人先生传》)中透露一点消息外,恐怕最多的是寄托在他的大量咏怀诗里。这种诗随感而发,随意抒写,正好发泄他的满腔郁闷,充分表露了他的思想感情,也达到了他的文学天才和造诣的最高峰。因此,探讨他的咏怀诗,就成了研究他的思想和文学的中心问题。

阮籍的文学,在中国中古时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很高的。尤其是他的咏怀诗,后来的人对它都一致推崇,有的说是凌驾他的前人而直承曹子建,更有人说是凌驾曹子建而直承楚骚、汉赋,也有

人说唐朝的李太白就是直接承着他(以上均见本集附录,在此不具引);反之,加以贬抑的概所未见。

鲁迅先生也说过,阮籍的散文做得很好。的确,他的几篇赋,笔调、词汇乃至其夸张处,都还是汉人面貌,不像晋以后那种雕琢、藻饰的样子。他的散文,如《达庄论》这种理论性的文章,其首尾两段,竟是辞赋的写法。又如传记性质的《大人先生传》,刘师培先生说它:“其体亦出于汉人设论(原注:如《解嘲》之属),然杂以骚赋各体,为汉人所未有。”也许他写的散文本来不多,流传下来的更祇寥寥此数,所以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不大。刘先生只举出伏羲《与嗣宗书》、张辽叔《自然好学论》(原注:辽叔此文,与阮为近)、刘伶《酒德颂》、嵇叔良《阮嗣宗碑》(原注:此文盖仿阮文为之)几篇。刘先生说:“西晋之士,其以嗣宗为法者,非法其文,惟法其行,用是清谈而外,别为放达。”(以上所引刘师培先生语,均见《中古文学史讲义》)

阮籍的《咏怀》诗则不然,千余年来,虽一直为人所讽诵,但正如钟嵘所说“厥旨渊放,归趣难求”(《诗品》),是那么难于捉摸。这些诗不是成于一时,也并非特意而作,只是随时抒感,后人在编辑这些篇章时,凭所得的一个概括的印象而加上了“咏怀”这个题目,因此很不容易把它的真意一句一字地读懂。就是和他的时代比较接近,而本人又是很有成就的诗人,如颜延之、沈约诸人,也只能总说一句是“忧生之嗟”。尽管如此,这些诗读起来还是很美的。

阮籍《咏怀》诗的意旨成了一个“谜”,而“谜底”则随他的死去而湮没,永远无法核对。然而有了这样好的“谜面”,自然就不断有人去猜。从颜延之、沈约直到李善诸人,都还采取谨慎的态度,只说一个总的印象是“忧生之嗟”,并没有按某首某句去扣合。到了后来,就有人配合着阮籍当时的政局去推测他的某首诗的含意。

这本来是对的。以阮籍的思想和他所遭遇的世变，他的这些抒怀诗决不会无端兴起，而必定是有个端的。从当时的政事去探索他的这个端，当然是一条最可取的研究途径。可是，这要十分慎重，如果勉强去迎合，就不免失之穿凿附会，更何况还有人有意附会去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呢？我们必须把他们的这些说法加以辨别。

首先作这种探索的，是唐朝继李善之后注《文选》的“五臣”。他们在好些首《咏怀》诗的注里都提到阮籍是在“刺司马文王（司马昭）”。他们认为阮籍是必然忠心于魏的，对“司马昭之心”是必然恨得“牙痒痒的”。他们这种说法有没有根据呢？没有。阮籍曾经不肯应魏太尉蒋济的辟命，又托病辞去魏顾命之臣大将军曹爽的参军而“屏于田里”，可另一方面却一连做了司马懿、司马师、司马昭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，和司马昭更是相处得最久，并且很相得。在司马昭的座位上，别人都是毕恭毕敬，他却可以不拘礼教。在垂死之年，离开司马昭的大将军府去做步兵校尉后，还是“恒游府内，朝宴必与”（《晋书》本传）。甚至在何曾公开地向司马昭攻讦他时，司马昭却说：你们不能为了我而容忍他么？可见阮籍这个人的存在，对司马昭还是有用的。再看他把卢播推荐给司马昭时所说的话：“若得佐时理物，则政事之器；衔命聘享，则专对之才；潜心图籍，文学之宗；敷藻载述，良史之表。”他把这样一个多方面出色的人才（虽然卢播这人后来默默无闻）推荐给司马昭，不能说不是出于为司马昭打算的。怎么可以设想阮籍在形迹上和司马昭如此亲密，心意又如此投合，而骨子里却是“心存魏阙”，左一首《咏怀》刺司马文王，右一首《咏怀》刺司马文王呢？从阮籍的论著所包含的思想以及各种史籍里关于他的记载来看，看不出他会是这样一个两面人物。何况他还明明为魏国的大臣们写了那篇给司马昭的《劝进笺》呢？“五臣”和以后同他们一鼻孔出气的那班人，为了要

证实阮籍是像他们所要标榜的那样的忠臣，于是作了种种解释。有人说，阮籍既做过曹爽的参军，似乎一朝受命，君臣之分已定，就一定会矢志不移。但是，阮籍不也做了司马父子的从事中郎，而且时间更长久得多么？有人说是“元瑜之子，固应尔”，这是说，忠臣之后必然也是忠臣。但我们看看阮瑀又怎样呢？他曾逃避过曹操的罗致，最后也只是做了记室，况且那时名义上还是汉朝的天下，而阮瑀早在魏国受禅的前八年就已死去了。有人替阮籍惋惜，说他不应该写那篇《劝进笺》。也有人替他开脱，说他只劝司马昭接受“晋王”和“九锡”之命，最后做一个像支伯、许由一类的“让王”，不要真的做皇帝，所以还是忠心于魏。这真是天真得可笑。“王”和“九锡”会是怎样的结果，大家当然都是莫逆于心。但那时虽然禅让之局已定，究竟最后一层的幕布还没有揭开，司马昭还在虚伪地表示“让德”，怎么能公然要他“受兹大宝，传诸无穷”（梁启超《异哉！所谓国体问题者》）呢？万一司马昭故作姿态，不是要怪罪下来么？阮籍写的这篇文章的最后几句，不过是措辞巧妙而已，其布局和所用典实词汇，都显然是以潘勖起草的对曹操劝进的那篇文章为蓝本的，也就可见阮籍的心中是把晋之代魏和魏之代汉看作历史故事的重演，没有什么可以惊异的了。“五臣”以后那班人的种种说法，都是未能自圆其说的。那么，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歪曲呢？原来他们都是有自己的政治目的的。罪魁祸首是“五臣”。“五臣”中虽然只有两人官居微职，其余三人都是所谓的“处士”，但唐朝的所谓处士，本来就是走“终南捷径”的人。“五臣”本是些“陋儒”（苏轼语），于《文选》这部书甚少贡献，但他们都藉着注书的机会，正好表示自己一朝得意，必然是忠心耿耿的。他们连郭璞的《游仙诗》都要牵扯到忠君爱上这一点，何况阮籍本是官居“二千石”的人，他的《咏怀》诗又是个谜，他们怎肯不乘机捣弄一番呢？从“五臣”以后直到清朝的何焯、

蒋师爚诸人,凡是带上这副着色眼镜的,都可作如是观。黄节先生自然是例外,他“尝以辨别种族,发扬民义垂三十年”(黄节《阮步兵咏怀诗注自叙》),不过,他觉得“世变既亟,人心益坏,道德礼法尽为奸人所假窃”(同上。当时窃国者大倡其所谓“礼治”),阮籍实在恨当时的司马昭,他要“指桑骂槐”。所以黄节先生说:“余于此时不重注嗣宗诗,则无以对今之人。”又说:“欲使学者由诗以明志而理其性情,于人之为人,庶有裨也。”他同样也是抱着一个政治目的去注阮籍的《咏怀》诗,但和“五臣”诸人不可“同日而语”,这是应该加以区别的。

当然,阮籍并不是死心塌地地依附司马氏,他既没有像贾充、王经那班人攀龙附凤以猎取富贵,也没有像郑冲、王祥那班人依违取容以保持禄位。他是一个有抱负、有理想的人,因此,对于司马父子的所作所为,断然不能件件满意。特别是高贵乡公这样一个“才同陈思,武类太祖”(《三国志》注引《魏氏春秋》载钟会语),以夏少康自命(《三国志》注引《魏氏春秋》:“帝慕夏少康。”又与群臣论夏少康与汉高祖之功德谁宜为先,认为“汉祖功高,未若少康盛德之茂”,“仁者必有勇,诛暴必用武,少康之盛,岂必降于高祖”)的非常之主,阮籍做过这位少主的散骑常侍,封了关内侯,对于少主之横死必然不能无动于衷,这些应该在他的《咏怀》诗里得到反映。可是,他的《咏怀》诗决不都是最后几年才写的。在以前更长一段时期内,对于魏明帝以至曹爽兄弟这班人的所作所为,也不能无所臧否,这些,也必然在他的《咏怀》诗里得到反映。总之,他的《咏怀》诗里如果有所谓“刺”,那是以他自己的是非、善恶的标准来作衡量,决不是站在忠于曹家的立场而痛心于司马氏的篡逆。

我以这样的看法来读阮籍的《咏怀》诗和前人的注释,我提出了若干新的解释,同时批判了一些前人的说法。我不敢说我的解

释已接近于揭穿一些谜底。不过,我相信如果不断地有人本着客观的态度和历史的眼光去读它,总可以把这个谜揭得更圆满一些。我希望我是在这个工程上加上了一撮土。

陈伯君

序

例 言

一、旧时校书者往往以一本为据，而取他本校之，注出其文字异同。至于何字为可从，则恒不加断定，任读者自择。本书则不专据一本，系将各本互校之后，遇有文字异同之处，择其可从者作为本文，可彼可此者，则以多数者为归。盖校书之目的，应在订正讹舛，使读者于读本文时易得其解，非为校书而校书也。但恐个人识解有限，所取之字或有未当，所不取之字其义反而较胜，故只作为向读者建议，仍分注他本异同于下，以供读者参酌。惟明显为误字者则不注，例如：《亢父赋》“钜野瀦其后”之“瀦”字薛本作“猪”，“穷济尽其前”之“济”字范陈本作“齐”之类。又汪士贤刻本不精，字多讹舛，无甚足取；严可均本几全据范陈本而间校以《艺文类聚》，此二本除偶有例外者，皆不一一出校。程荣校刻范陈本，除校改者外，其相同者亦不注出。这样，不仅本文择善而从，易于通读，其他各本之面目亦可于此窥见，不必再检原书。

二、旧时校书者往往只取数本以校所据之本，本书则尽力搜求所能够求得的各种版本而互校之，惟个人所见有限，容尚有他本为搜求所未及者。

三、旧时校书者往往只注意本集或类书所引而鲜及于选本。